

资源型城市乡村产业振兴的政企协同逻辑

——基于P市灵芝产业政策的案例分析

杨 子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2日

摘 要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资源型城市因长期的“重工轻农”路径依赖, 其乡村产业转型面临严重的要素流失与结构固化困境。本文融合新结构经济学、政策工具理论与“官场 + 市场”理论, 以东北典型资源型城市P市的灵芝产业政策为单案例研究对象, 深度剖析了资源型城市乡村产业振兴的政企协同逻辑。研究发现: 第一, 在产业转型初期, 地方政府作为“有为政府”, 通过综合运用供给型、环境型与需求型多元政策工具完成产业“搭台”, 有效吸收了早期沉没风险并克服了市场失灵; 第二, 在产业成长期, 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主体发挥“有效市场”功能, 依托“三产反推一二产”的商业模式创新与产学研技术攻坚实现产业“唱戏”, 成功防范了产业对政策的“温室依赖”; 第三, 政企深度协同的落脚点在于建立“企业 + 村集体 + 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实现了资本逐利与富民强村的统一。本文揭示了资源型城市打破低效均衡的微观机制, 为广大县域经济探索农业产业化与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了学理支撑与经验借鉴。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 乡村产业振兴, 政企协同, 政策工具

The Logic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Synergy i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A Case Study of Lingzhi Industry Policy in City P

Zi Y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Received: May 28, 2026; accepted: July 13, 2026; published: July 22, 2026

文章引用: 杨子. 资源型城市乡村产业振兴的政企协同逻辑[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7): 218-225.
DOI: 10.12677/ass.2026.15756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source-based cities face severe dilemmas of factor outflow and structural rigidity in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ue to long-term “industry-heavy, agriculture-light” path dependency. Drawing up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olicy Tool Theory, and the “Bureaucracy + Market”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ducts a single-case study on the Lingzhi industry policy of City P—a typical resource-based city in Northeast China—to deeply analyze the government-enterprise synergy logic i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ing as a “Proactive Government”, utilizes a mix of supply-oriented, environment-oriented, and demand-oriented policy tools to “set the stage”, effectively absorbing early-stage sunk costs and overcoming market failures. Second, during the growth stage, leading enterprises fulfill the function of an “Efficient Market”, leveraging “stage-performing” throug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s (where the tertiary industry drives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ectors) and R&D breakthroughs, thereby preventing “greenhouse dependency” on policies. Third, the cornerstone of deep government-enterprise synergy lies in establishing an interest-linking mechanism among “enterprises,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households”, achieving a harmony between capital profitability and rural prosperit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micro-mechanisms for resource-based cities to break inefficient equilibria,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lessons for county-level economies exploring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esource-Based Cities,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Government-Enterprise Synergy, Policy Tool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强调“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支撑。”[1]在这一宏观战略下，重塑县域特色产业体系被视为推动高质量振兴、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路径[2]。然而，对于长期依赖重工业和矿产开发的资源型城市而言，其乡村产业转型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深层次困境。长期的“重工轻农”战略导致资本、土地等核心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乡村产业普遍陷入“资源诅咒”与“路径锁定”，亟需通过科学的特色产业选择来促进经济发展[3]。但是，在传统农业收益低下与现代农业高门槛的双重挤压下，单纯依靠小农户的自发演进难以实现产业破局，需外部力量的强力介入与制度创新。

在推动县域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究竟应依靠市场主导还是政府干预，学术界存在长期的理论交锋。一方面，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往往因农业天然的弱势而陷入“市场失灵”。另一方面，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又极易引发信息不对称与资源错配，甚至有学者认为产业政策必然因扭曲激励机制而走向失败[4]，且不当的产业政策可能对企业的实质性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5]。为了超越这种非此即

彼的二元对立，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调和性框架，强调经济发展实质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这不仅需要“有效市场”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更需要“有为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为敢于创新的企业家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支持[6] [7]。在协作治理语境下，政府干预的核心不再是国家与市场的边界划定，而是寻求政企有效互动的弹性框架[8]。

将这种宏观的政企互动落实到微观治理层面，则表现为地方政府对多元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凡是政府决定做或不做的行为均可视为公共政策[9]，而政策工具则是政府实现特定产业目标的具体行政手段[10]。基于经典的“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三分法框架[11]，地方政府不仅能够通过资金与技术等供给型工具直接拉动新兴产业，还能将“土地要素”转化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空间与产业政策工具以重塑产业结构[12]。

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约束下，上述政策工具的运用逻辑深刻嵌构于地方官员的微观行为之中。在晋升锦标赛的压力与市场竞争的约束下，地方官员往往会化身为“政治企业家”，调动行政资源以提升本地企业的竞争力，这种“官场 + 市场”的双向嵌入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独特密码[13]。县域特色产业的强势崛起，本质上正是地方官员的“政治企业家精神”与本地“市场企业家精神”深度融合、优势互补的结果[14]。

尽管现有文献为理解乡村产业发展与政企互动提供了基础，但仍存有部分研究缺口。现有关于县域产业崛起的案例多聚焦于传统农业大县，针对“资源型城市”这一具有深重工业路径依赖的特殊场域，探讨其如何实现农业转型的微观机制研究仍然匮乏。此外，多数研究侧重于宏观政策效果评估，对政府政策工具如何与企业自主能力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实现动态适配、如何防范产业沦为“政策温室花朵”的协同黑箱缺乏细致刻画。基于此，本文选取东北典型资源型城市 P 市的灵芝产业政策为单案例研究对象，将新结构经济学与“官场 + 市场”理论相融合，试图揭示资源型城市乡村产业转型的政企协同逻辑，以期为广大县域经济探索农业产业化的乡村振兴路径提供学理支撑与经验借鉴。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资源型城市的乡村产业转型是在特定制度约束下的结构重塑。为了解释这一过程，本文融合政策工具理论以及“官场 + 市场”理论，构建了以下分析框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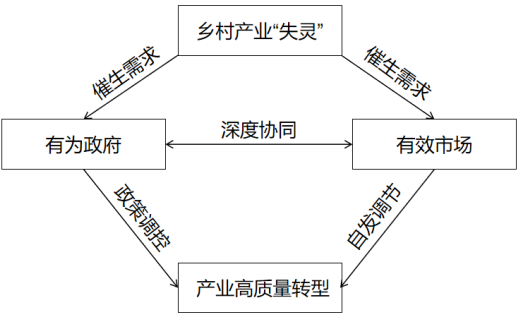


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图 1. 分析框架(作者自制)

2.1. 资源约束与“有为政府”

资源型城市长期存在“重工轻农”的路径依赖，资本单向流向工业部门，导致乡村特色产业面临极高的初始沉没成本与技术门槛。在这种强外部性与协调失灵的约束下，单纯依靠小农户的自发探索注定

陷入“市场失灵”，打破这一低效均衡亟需“有为政府”的介入。而在中国特色的县域治理中，“有为政府”的具象化体现为地方官员的“政治企业家精神”。在“官场 + 市场”的双重竞争压力下，地方主政者具有强烈的动机去发掘本地潜在的比较优势，通过主动承担产业导入期的试错风险。

2.2. 政策工具与“有效市场”

政府“有为”的关键在于通过合理的政策工具组合来克服市场失灵，进而激发“有效市场”。依据 Rothwell 与 Zegveld 的经典分类，地方政府的赋能行为可拆解为三类政策工具：一是“供给型工具”，即政府直接投入资金、土地与基础设施，夯实产业物理根基。二是“需求型工具”，通过市场引导与渠道对接，拉动产业规模化扩张。三是“环境型工具”，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打破行政审批壁垒，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三类工具的协同运用，旨在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风险可控、预期稳定的制度生态，促使“市场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释放，进而推动产业在技术研发、品牌塑造与模式创新上实现自我造血。

2.3. 政企协同

基于上述理论推演，本文构建的政企协同分析框架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征。在产业转型初期，政府扮演“破局者”角色，以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与制度供给的重任。在产业成长与扩张期，市场主体转变为“主导者”，企业依托政府搭建的平台，主攻商业模式创新与价值链攀升。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企业超越了传统的零和博弈，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互补的协同机制：政府负责吸收早期风险并传递宏观政策信息，企业负责捕捉终端需求并实现技术转化。最终，通过“企业 + 村集体 + 农户”的利益联结网络，将资本的逐利性与乡村振兴的普惠性相统一，实现从产业“政策造物”向“内生增长”的跨越。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资料搜集

为确保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遵循“三角互证”原则，通过多渠道收集一手访谈资料与二手文本数据，形成证据链条的相互印证。

3.1.1. 一手访谈资料

笔者于 2025 年 7 月至 8 月赴 P 市 S 镇及相关产业园区开展实地调研，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为保证视角的全面性，访谈对象涵盖了政、企、村、农四大核心利益相关群体，共计完成深度访谈 9 人次，具体访谈对象分布如下：

政府部门(1 人)：P 市农业农村局产业科负责人 1 人，重点了解政策出台背景与资金拨付情况。

企业主体(1 人)：R 企业市场部总监 1 人，重点了解商业模式创新方法。

村集体(2 人)：S 镇核心种植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人 2 人，重点了解土地流转村企合作模式。

农户代表(5 人)：包括参与灵芝种植的大户 2 人、普通散户 2 人、在园区务工的脱贫户 1 人，旨在了解农户收益变化与利益联结情况。

3.1.2. 二手文本数据

主要用于梳理产业发展脉络与政策演变。来源包括：

政策文件：《P 市东北长白山灵芝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¹《P 市种植业结构调整扶持政策》及

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长白山“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2024-01-02.
<http://www.changbaishan.gov.cn/shjj/qhgh/cbs145gh/>, 2026-07-15.

政府工作报告²。

统计数据：P市统计年鉴、农业农村局公报³。

企业与媒体资料：R企业的内部宣传册以及新华网、吉林农业网等权威媒体的深度报道。

3.2. 资料分析

本研究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单案例研究适用于回答“如何(How)”与“为什么(Why)”的微观机制问题，能够通过深度的情境剖析，揭示复杂现象背后的演进逻辑与因果链条。本研究选取东北典型资源型城市P市及其灵芝产业政策作为分析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初始条件的代表性。与鹤岗、大庆等传统东北资源型城市类似，P市长期依赖煤炭与林木采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资源依赖路径。其乡村地区同样面临严重的资本抽离、人口空心化问题。这种极端的初始劣势，使得该案例具有探讨资源型城市乡村转型的普适性背景。

第二，转型路径的独特性与启发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往往局限于接续型工业或城市服务业，而P市却成功将目光投向乡村，依托长白山余脉的自然禀赋，将原本零星散种的灵芝培育为年产值破亿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这种“跳出工业抓农业”的逆向破局，为同类城市打破“资源诅咒”提供了罕见的“极化案例”。

第三，政企协同特征的显著性。P市灵芝产业的崛起并非纯粹的市场自发演进，也非单纯的政府强制指令，而是经历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农户入局”的清晰演化脉络。其政策工具的运用与市场主体的响应具有契合度，是观察新结构经济学与“官场+市场”理论在微观落地过程的绝佳样本。

4. 案例分析

4.1. 初始困境：资源型城市乡村产业的“市场失灵”

作为东北地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P市的发展轨迹长期受制于“重工轻农”的路径依赖。在传统工业主导的财政导向下，乡村的核心生产要素遭遇严重的“虹吸效应”。数据显示，2010至2018年间，P市工业用地年均供应量为农业用地的5.3倍，工业补贴畸高导致农业投入严重萎缩。更为严峻的是，伴随区域经济下行，P市18-40岁青壮年群体流失率高达37.5%。人口空心化与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直接动摇了乡村振兴的根基，传统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模式已难以提供足够的产业附加值来留住乡村人口。

面对传统农业的低效率，部分农户曾尝试自发突围。P市地处长白山西麓，林地面积占比超46%，昼夜温差大，具备极佳的食药菌生长条件。早在2013年，S镇部分农户便开始尝试灵芝大棚种植。然而，灵芝产业属于资金密集与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农业，小农户在缺乏整体规划、深加工技术与销售渠道的背景下单打独斗，产品仅能以初级干片或原始孢子粉形式在周边低价出售。这种高昂的早期沉没成本与极低的市场抗风险能力，导致P市早期的灵芝种植陷入“有种植而无产业体系”的低效状态，市场机制在此处发生了明显的“失灵”。

打破市场失灵的僵局，亟需地方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破局作用。2020年，在国家“小木耳，大产业”宏观战略的启发下^[15]，P市农业农村局展现出强烈的地方“政治企业家精神”。政府并未凭借主观臆断盲目上马项目，而是组建考察组进行深度调研。调研不仅明确了全国灵芝产业“南热北冷”的市场竞争格局，更通过科学检测论证了长白山灵芝在三萜和多糖核心成分上的绝对比较优势。基于详实的

²磐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磐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磐石市2021年种植业结构调整扶持政策的通知: 磐政办函(2021)9号. 2021-02-07. http://xxgk.panshi.gov.cn/szf/xxgkml/202103/t20210326_942108.html, 2026-07-15.

³磐石市统计局. 2024年磐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5-06-03.

http://www.panshi.gov.cn/zjps/jjzf/tjxx/202506/t20250605_1269811.html, 2026-07-15.

信息收集，P 市政府果断将灵芝产业确立为乡村产业转型的突破口，由此拉开了政企协同发展的序幕。

4.2. 有为政府：政策工具赋能与生态重塑

针对灵芝产业初期投资大、农户“不敢种”的瓶颈，P 市政府通过强有力的供给型工具直接注入生产要素。在资金端，市县两级积极争取省级食药菌奖补资金 927 万元，并累计发放市级灵芝种植补贴 2560 万元。更为关键的是，P 市政府创新财政金融手段，成功争取 1 亿元专项债券资金用于建设标准化厂房，并投入 2000 万元衔接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在土地与基建端，出台《种植业结构调整扶持政策》⁴，政府出面统筹土地流转，开辟园区用地审批“绿色通道”，提供铺路、打井、办电等定制化政务服务。这些硬核的供给型工具，实质上是政府替市场主体吸收了产业导入期的巨大沉没成本与基建风险。

产业向深加工迈进，必然面临严格的行政准入壁垒。为防止繁琐的审批扼杀企业活力，P 市积极运用环境型政策工具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此外，在治理模式上，P 市创新采用“整镇推进”模式，发挥乡镇党委统揽全局的制度优势，将同类型项目、资源与人才捆绑，打破了传统农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分散局面。

政府不仅提供供给，还通过需求型工具进行预期管理。《P 市东北长白山灵芝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⁵的出台，向市场释放了强烈的长期支持信号，确立了“市场引领 + 全产业链发展”的战略基调。同时，政府规划建设“一核心、三基地”的产业集群，以开发区为核心集散物流，以 S 镇等为种植基地，通过集群化品牌的打造，有效拉动了外部市场对 P 市灵芝的需求预期。

4.3. 有效市场：企业主体激活内生发展动力

政府的“搭台”若无市场的“唱戏”，极易沦为无效的“面子工程”或让企业养成“温室花朵”般的政策依赖。在 P 市案例中，以 R 企业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充分发挥了“市场企业家精神”，通过商业模式与技术创新，激活了产业的内生动力。

传统农业往往陷入“种什么卖什么、种得好卖不好”的盲目生产困境。R 企业敏锐捕捉数字化转型机遇，与国内头部短视频直播平台达成战略合作。企业利用大数据精准分析消费者对灵芝产品的偏好与需求量，提出了“以三产(线上销售)数据反向确定二产(加工品类)及一产(种植规模)”的闭环反馈模式。这种由终端市场需求直接驱动前端生产的商业模式，极大降低了库存风险与销售成本，确保了产业扩张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

同时，摆脱低端原料供应商的定位，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R 企业积极寻求产学研合作的“智力赋能”。企业联合吉林农业大学李玉院士团队及地方医学院校，设立“灵芝科技小院”。通过引入前沿科研成果，不仅解决了灵芝重茬种植病虫害等农业技术难题，更成功研发出灵芝孢子粉、灵芝人参茶、桑黄口服液等高端系列产品。科技赋能使灵芝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了从原料级到精深加工品近八倍的飞跃。

综上所述，P 市灵芝产业的蜕变，生动诠释了资源型城市乡村产业转型的内在逻辑。在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中，产业兴旺是基石，共同富裕是核心。P 市通过“有为政府”的政策工具搭台，激发了“有效市场”的创新活力，最终通过严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将产业增值收益留在了乡村，留给了农民。这一政企协同的治理范式，为破解县域乡村产业“起步难、升级难、带农弱”的普遍困境，提供了一条极具参考价值的县域农业现代化本土路径。

⁴磐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磐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磐石市 2021 年种植业结构调整扶持政策的通知: 磐政办函(2021)9 号. 2021-02-07. http://xxgk.panshi.gov.cn/szf/xxgkml/202103/t20210326_942108.html, 2026-07-15.

⁵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长白山“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2024-01-02. <http://www.changbaishan.gov.cn/shjj/qhgh/cbs145gh/>, 2026-07-15.

4.4. 挑战与冲突

尽管 P 市灵芝产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将其视为一个毫无摩擦的完美过程则有过度简化之嫌，P 市的产业发展同样伴随有多方主体的利益冲突。

在产业导入初期，为快速扩大规模，P 市政府曾采用“按种植面积普惠性补贴”的粗放型供给工具。这导致部分农户与企业为套取补贴盲目扩建大棚，忽视了田间管理，一度引发低端原木灵芝产能过剩、价格倒挂的危机。面对这一政策失误，P 市政府迅速调整政绩导向，将政策工具从“面积补贴”转向“品牌与深加工奖补”，倒逼产业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型，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干预中的动态学习过程。

而 R 企业在主导“三产反推一二产”的初期也曾因对直播电商算法规则不熟悉，遭遇过大量库存积压与资金链紧张的危机。同时，科研院所的部分实验室技术在田间转化时因水土不服而失败，企业承担了高昂的试错成本。这表明，市场主体在承接政府赋能后，其内生能力的培育是一个充满阵痛的长期过程。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如何打破“重工轻农”的路径依赖、实现乡村产业的高质量转型，是一个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与“官场 + 市场”理论，对 P 市灵芝产业政策的演进历程进行了单案例深度剖析，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资源型城市乡村产业的破局，高度依赖于地方官员“政治企业家精神”的觉醒与“有为政府”的前期介入。面对高昂的沉没成本与市场失灵，地方政府通过精准的产业选择，综合运用供给型、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有效吸收了产业导入期的早期风险，完成了产业“搭台”。

第二，乡村产业的可持续跃升，根本上取决于“有效市场”的主导与“市场企业家精神”的释放。在政府搭建的平台上，龙头企业通过“三产反推一二产”的商业模式创新与“产学研结合”的核心技术攻坚，实现了产业链的闭环与价值链的跨越式攀升，成功防范了产业沦为缺乏内生动力的“政策温室花朵”。

第三，乡村产业转型的成功密码在于“政企深度协同”与“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政府与市场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互补。通过设定普惠性前置条件，政企协同最终促成了“企业 + 村集体 + 农户”共富共同体的形成，将资本逐利与富民强村完美统一，实现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最终闭环。

5.2. 政策启示

P 市灵芝产业从零星种植到全产业链集群的蝶变，为广大县域经济体探索乡村振兴提供了极佳范本。然而，P 市模式的成功高度依赖于三大前提条件：一是不可复制的自然禀赋，长白山余脉充沛的林地资源与适宜的温差，构成了产业硬约束。二是极具魄力的地方主政官员和企业家的深度合作。三是特定的宏观机遇，精准踩中“小木耳，大产业”政策风口与直播电商下沉红利。因此，跨区域借鉴该模式时切忌盲目照搬，必须基于自身条件进行适配，警惕潜在的实践陷阱，具体启示如下：

一是坚持“因地制宜”与“市场导向”，科学确立特色产业体系。县域产业选择切忌盲目跟风或长官意志的“拍脑袋”决策。地方政府在谋划产业转型时，必须深入开展市场调研，精准识别本地的自然禀赋与比较优势。只有将本地资源的独特性与宏观市场的需求缺口紧密结合，才能找准产业破局的支点。

二是厘清政企边界，实施“动态适配”的政策工具组合。产业政策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大包大揽。在产业萌芽期，政府应加大供给型工具投入，重在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与优化营商环境。当产业进入成长期后，政府应适时后退，减少直接补贴，转而运用需求型和环境型工具，将主导权交还给市场，倒逼企

业在真实的竞争环境中培养核心竞争力。

三是坚守“富民强村”初心，夯实多方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产业振兴的根本目的是农民增收。各地在引进龙头企业与社会资本时，必须从政策设计层面完善利益分配格局。应大力推广土地流转溢价返还、订单农业保底收购、就近务工吸纳以及利润二次分红等多元化联农带农模式。只有让广大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充分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才能真正汇聚起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7000499.htm, 2025-01-22.
- [2] 斯丽娟, 曹昊煜. 县域经济推动高质量乡村振兴: 历史演进、双重逻辑与实现路径[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75(5): 165-174.
- [3] 辜胜阻, 李华, 易善策.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新思路[J]. 经济纵横, 2010(2): 34-38.
- [4] 张维迎. 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J]. 中国连锁, 2016(11): 84-86.
- [5] 余明桂, 范蕊, 钟慧洁. 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 2016(12): 5-22.
- [6]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J]. 理论学习与探索, 2023(2): 5-8.
- [7] 王勇. 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J]. 学习与探索, 2017(4): 100-104+175+2.
- [8] 顾昕. 协作治理与发展主义: 产业政策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J]. 学习与探索, 2017(10): 86-95.
- [9] Dye, T.R. (1975)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Pearson.
- [10] 陈振明. 政策科学: 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70.
- [11] Rothwell, R. and Zegveld, W. (1985)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Longman Group Limited, 83-104.
- [12] 闫昊生, 孙久文, 苏玺鉴. 土地要素: 一个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J]. 经济学家, 2019(5): 104-112.
- [13] 周黎安. “官场 + 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J]. 社会, 2018, 38(2): 1-45.
- [14] 刘蓝予, 周黎安. 县域特色产业崛起中的“官场 + 市场”互动——以洛川苹果产业为例[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 17(2): 116-127+173.
- [15] “小木耳”长成“大产业” [EB/OL]. 2020-09-07.
https://www.moa.gov.cn/xw/qg/202009/t20200907_6351662.htm, 2025-7-10.